

试论鲁迅早期的思想和文艺观

楚

汛

鲁迅少年时代就喜爱文学艺术。从留学日本时期开始，他就一直以文艺为武器，为中华民族和劳苦大众的解放而英勇奋战了一生。“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为建立中国新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进行了廓清、奠基、开拓的伟大工作。他光辉一生的革命文艺实践和对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至今仍然是留给革命人民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一份宝贵遗产。

同迄今出现过的许多伟大历史人物一样，鲁迅是在时代的潮流中孕育成长，而又指导着时代潮流前进的。他生活和战斗的年代，正是中国外遭列强蹂躏，内受封建桎梏的黑暗年代，又是民主革命风雷激荡，变革急遽的年代。随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转变和深入发展，鲁迅的思想发生了两次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五四运动前后，由早期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迈开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步子，成为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前后，则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实现了世界观的飞跃。与此相适应，鲁迅的文艺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由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从留学日本到“五四”前夜（1902—1918），属于旧的革命民主主义范畴的早期文学活动和文艺思想；（二）“五四”时期到大革命失败前后（1918—1927），作为新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艺实践，和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的文艺思想；（三）上海十年（1927—1936），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文艺实践，和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鲁迅早期的文艺思想，在整个旧民主主义时期，达到了革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的最高水准，又是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为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一个出发点和基础。本文试就这一时期鲁迅的思想和文艺观进行一些探讨。

一

鲁迅赴日学习期间，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九〇〇年爆发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给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以有力的打击。但是，在“八国联军”武装入侵的淫威面前，清朝政府进一步慑服拜倒在侵略者的脚下，甘愿充当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了，也更激起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一九〇四年，以章太炎为首的光复会成立，鼓吹反清革命；一九〇五年八月，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光复会、华兴会、兴中会等联合，在东京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

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很快就丧失它的进步性，堕落成了仇视革命、反对革命的保皇派。他们继续散布君主立宪的幻想，与同盟会争夺群众。于是，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展开了一场革命还是保皇的大论战。这场论战使革命派与改良主义划清了界限，教育了许多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鲁迅就正是在这场斗争中初试锋芒，并形成他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观点。

当时的东京，是革命派在海外的一个活动基地，经常举办各种反清的集会和讲演，出版革命书刊；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即在这里创刊发行，成为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批判改良主义的重要战斗阵地。留日的中国学生界也纷纷创办各种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及《河南》等，鼓吹光复反帝，革命空气相当浓烈。这样的革命环境，自然会给鲁迅以深刻的影响。他在赴日之前，虽然“排满的学说和辫子的罪状和文字狱的大略，是早经知道了一些的”^①，但主要的还是接受了风靡一时的“维新”思想的影响。他赴日学医，就因为“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想用医学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②。来到这弥漫着革命空气的东京以后，鲁迅经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③，积极投入各项革命活动。他参加光复会，出入《民报》社，阅读革命书刊；接触了许多革命人士，思想因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对形成鲁迅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孙中山和章太炎。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当年曾多次到日本开展革命活动，“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④鲁迅曾和留学生们一起开会热烈欢迎孙中山，听过他的讲演^⑤，对他的革命思想和业绩一直十分钦敬，后来又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中山先生……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是一个“永远的革命者”^⑥。至于鲁迅与章太炎，关系更为密切。一九〇三年，章太炎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斥改良派吹捧的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驳斥康有为宣扬君主立宪的谬说，又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张扬反清革命，至因《苏报》案而被捕，曾轰动海内外。鲁迅当时即非常景慕章太炎的革命品行和学问文章，喜爱“先生狱中所作诗”；又爱读章太炎出狱后主编的《民报》，赞扬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作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前去听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也“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是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⑦。以后数十年间，鲁迅对章太炎始终存着深厚的情谊，并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文章中给先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这种情况表明，鲁迅早期对孙中山、章太炎，不仅仰慕其为人，而且热烈赞同并接受了他们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在同改良派的论战中，鲁迅坚决站在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边，对改良派鼓吹的君主立宪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等宣扬中国只能由“君主”（专制）经“君民共主”（君主立宪）才能进入“民主”（共和），而且附会人类史，说他们这种“循序而行”的理论，“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⑧。即是说，中国只能立宪，不能越级而为共和。鲁迅针锋相对地驳斥说：

谭人类史者，昌言专制立宪共和，为政体进化之公例；然专政方严，一血刃而骤列于共和者，宁不能得之历史间哉。^⑨

多么明确的革命的结论！通过“血刃”，“戮列于共和”，否定了康梁鼓吹的庸俗进化的改良主义道路。鲁迅并揭露改良派兜售的所谓“立宪国会”是借“众治”的名义，“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这些人多数是“盲子”，少数则是“垂微饵以冀鲸鲵”的“巨奸”。他们假立宪之名，来保护封建皇制，保存封建制度，并“大遂其私欲”。鲁迅指出这样的“众治”比暴君专制更厉害，“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⑩。这就充分揭露了君主立宪口号的反动性和保皇党人的丑恶嘴脸，表现出鲁迅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鲜明立场和战斗思想。

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鲁迅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突出表现。鲁迅本是为着救国救民寻求真理，怀着满腔爱国主义热忱而东渡的。身居异域，曼思故国，更深切怀念“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帝国主义列强“执势力平均之说，群起夺地”，给祖国带来的严重危机，进一步激起了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他毅然剪去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并写下《自题小象》这著名的诗篇，表达了他以身许国的庄严誓愿。与此同时，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指出，帝国主义“强种鳞鳞，蔓我四周”，不仅铁蹄蹂躏中国，造成“枭颅成束，流血碧地之惨象”，而且“伸手如箕，垂涎成雨”，“足迹所至，要索随之”，对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作了深刻的揭露；同时，又愤怒地斥责了清朝统治者“引盗入室，助之折桡挠栋，以速大厦之倾”的卖国贼行径。鲁迅大义凛然地宣告：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觐者也。

他呼唤“豪侠之士”，“奋袂而起”，反抗帝国主义和腐败卖国的清政府，以挽救祖国的危亡。从这里，我们不是可以强烈地感触到青年鲁迅那直欲拔剑而起，“血荐轩辕”的伟大爱国主义情怀么？

二

早在南京求学期间，鲁迅即开始较系统地接触了西方传来的近代自然科学，并成为赫胥黎《天演论》的热情读者。这部书介绍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对鲁迅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日本后，他接触了更多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包括那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逐步形成了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发展进化的革命历史观。而这就成为鲁迅早期革命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全部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关于物质与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⑪鲁迅明确地站在唯物主义方面，运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指出自然界的发展及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即造化自著之进化论，而达尔文剽窃之以成十九世纪之伟著也”^⑫。鲁迅认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只是对自然界（造化）自身的发展及其规律的“剽窃”，即是反映，坚持了客观的物质世界为第一性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这一时期，鲁迅写的关于自然科学及科学发展史的几篇论文，不仅可以说明他学习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理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反映出他在自然观方面坚实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在这些论文中，鲁迅高度评价了恩格斯誉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的达尔文进化论，赞扬那些敢于坚持真理，蔑视神学权威，具有革新创造精神的伟大科学家，论述了科学的发展对于改造自然，推动社会进步和增进人类生活的幸福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在《说钋》（钋即镭）一文中，鲁迅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镭的发现，满腔热情地加以赞扬和介绍，说是“辉新世纪之曙光，破旧学者之迷梦”的“伟功”。鲁迅说，科学上“自X线之研究，而得钋线，由钋线之研究，而生电子说”，代替了原子说，证明了物质的可分性和元素可以互相转化，因而使旧的“关于物质之观念，倏一震荡，生大变相”。他指出这是一种“吐故纳新”的现象，“败果既落”，必然“新葩欲吐”，正是科学上的巨大进步。鲁迅在总结人类和科学发展的历史时，指出事物的发展进化，“自卑而高，日进无既”^⑬，由低级到高级，没有止境；事物的这种发展进化又不是直进的，“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⑭。鲁迅关于事物发展进化的“吐故纳新”和曲折前进的思想，表明他基于进化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突破了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框子，形成了鲜明的唯物辩证的发展进化观点。

鲁迅以达尔文学说为基础形成的发展进化的革命历史观，使他在民主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坚信社会愈发展愈进步，“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⑮；而对哪些“死抱国粹之士”^⑯的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鲁迅则给予猛烈的抨击，显示了这种革命历史观的战斗精神。应当着重指出的是，鲁迅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发展进化的革命历史观，同庸俗进化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如前所述，鲁迅在政治上否定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改良主义道路，正是在思想上否定庸俗进化论的结果。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那完全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政策效劳的反动理论。它歪曲达尔文学说，用生物界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来解释人类社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奴役被压迫民族的罪恶行径，披上“天演公例”的外衣。鲁迅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所处的地位，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决定他不仅要否定庸俗进化论的改良主义道路，更必然同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根本对立。他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为了用它来激励被蹂躏、欺凌、压迫的中华儿女发愤自强，奋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统治，使中国“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⑰。因而，对帝国主义者及其侵略政策的辩护士们，鲁迅理所当然地特别憎恶，而且屡加挞伐。他们用武力“狼藉人之自由”^⑱，却还喋喋不休地夸耀本国武器如何精良，以获地杀人众多为宗国“晖光”，鼓吹法西斯强盗式的爱国主义。鲁迅愤怒斥骂他们是“兽性爱国之士”，并且指出他们是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盖兽性爱国之士，必生于强大之邦，势力盛强，威足以凌天下，则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弱小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嫌也。^⑲批判“执进化留良之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揭露其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反动本质，这么深刻有力，在当时中国思想界是罕见的。

这一时期，鲁迅除了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外，也介绍并借用过尼采的某些思想观点。我们应该把它摆在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来考察，以得出正确的认识。十九世

纪后期，中国资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运动正蓬勃兴起，资本主义已经走完它上升发展的道路，向帝国主义过渡。一些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用各种反动的唯心主义学说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尼采哲学正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一种唯心主义的反动学说，它继承反动资产阶级哲学家叔本华的唯一意志论和天才论，宣扬“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主张强力就是道德，“超人”应该统治和奴役“群氓”、“庸众”，“弱肉强食”是自然规律，公然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政策辩护，成为法西斯哲学的先驱。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向西方学习时，“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②0}，除大量介绍和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唯物主义外，也介绍过某些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唯心主义学说，其中即包括尼采哲学。自然，这种介绍和吸取，一般都经过某些改造、更新或附会某种新的意义；而且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情况又很不相同，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如章太炎主持《民报》，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时，即介绍和吸取过叔本华、尼采哲学的某些思想材料。在近代资产阶级文艺、学术思想方面较有影响的王国维，在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年间，也介绍过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及美学思想，并称颂他们是十九世纪德国哲学界的“二大伟人”^{②1}。鲁迅显然是在当时的潮流影响下介绍尼采的，而又来不及深入认识尼采哲学的反动本质。然而，必须明确指出，鲁迅只是借用尼采的某些思想材料，在当时急迫的阶级斗争中作为鼓吹“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主义统治的一种思想工具，与尼采哲学的反动立场和反动目的是根本不同的。这一点，只要我们分析一下鲁迅主要介绍和借用过尼采的那些观点，就会很清楚。（一）是反偶像，扫荡旧文明。鲁迅当时认为，十九世纪末尼采诸人的哲学思潮，“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掙击扫荡”；并说可以“作旧蔽之药石，造新生之津梁”^{②2}。后来还多次说到托尔斯泰、尼采是“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②3}，是“轨道的破坏者”，“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②4}。尼采破坏反对的是一切不适应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和道德形式。显然，鲁迅并未深究其具体内容，只是借其思想的外壳，用以扫荡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道德传统。（二）是“自强”的精神。鲁迅在分析拜伦作品时指出：“尼佉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此则亦欲自强，而力抗强者，好恶至不同，特图强则一而已。”^{②5}鲁迅为祖国的独立自强而奔走呼号，虽然也借用尼采的“图强”，但鲁迅所处的被压迫民族的地位，使他自然地倾向于拜伦“力抗强者”的态度，而对尼采的“颂强者”、“弱肉强食”的理论，则明显地含有批判的意思。（三）是“非物质，重个人”。鲁迅介绍尼采的“超人哲学”来宣传“个性解放”，提出了“掙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②6}，锋芒所向，是在批判洋务派“抱枝拾叶”的“富国强兵”论和改良派“君主立宪”的谬说，揭露他们拜倒在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脚下，对资本主义的“偏颇”文化“物质”、“众数”等馨香顶礼的反动本质。至于“个性解放”，在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反对中世纪封建统治的斗争中，曾经起过革命作用，到十九世纪后期，随着资产阶级走向没落而逐渐变成了反动的意识形态。但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以至“五四”时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却仍然有它一定的革命作用。鲁迅主张“重个人”“张灵明”，乃是注重思想启蒙，唤起民众的觉悟，以达到“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②7}的革命目的。因此，与尼采蔑视群众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超人”哲学是大相径庭的。不庸讳言，鲁迅当时也受了尼采思

想的某些影响，他还不可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鉴别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唯物主义思想与反动的唯心主义思想，并不适当地强调了精神、“意力”及个别“天才”、“先觉”的作用，这正是鲁迅早期世界观的局限。

综观鲁迅早期的世界观，在自然科学方面是唯物主义的，在社会问题的认识方面，具有辩证发展的进化观点，达到了当时思想界可贵的革命高度，且有某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或萌芽。但是，鲁迅的历史观，总的看来，还基本上是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他还不可能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理解社会问题，认识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却过分强调了个别杰出人物和主观精神的作用。这是那个时代，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近代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所限制的。任何理论的传播和运用的程度，最终取决于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环境对这种理论的需求程度。只有在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而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才具备了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条件。尽管鲁迅留日期间，在文字资料上有可能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却不可能超越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去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不能苛求于鲁迅的。辛亥革命失败以后，鲁迅曾一度陷入深沉的失望、怀疑和苦闷，正是他世界观局限的反映，而又带着深刻的时代特征，即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入死胡同，而无产阶级还未登上历史舞台，还未成熟的那个时代，在鲁迅思想上反映的产物。所以，到十月革命和“五四”前后，当鲁迅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②③}，并从俄国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②④}以后，他就迈开了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投入了新民主主义的斗争。

(待续)

注：

①③ 《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想起的二三事》

② 《呐喊·自序》

④ 毛主席：《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1页

⑤ 参见日本增田涉著《鲁迅的印象》

⑥ 《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

⑦ 《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⑧ 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见《饮冰室文集》卷三

⑨⑫ 《集外集拾遗·中国地质略论》

⑩⑪⑭⑮⑯⑰ 《坟·文化偏至论》

⑪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0页

⑬ 《坟·人之历史》

⑭⑮ 《坟·科学史教篇》

⑮ 《三闲集·序言》

⑰⑱ 《坟·摩罗诗力说》

⑲ 《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

⑳ 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1406页

㉑ 王国维：《静庵文集·叔本华与尼采》，见《海宁王静庵先生遗书》

㉒ 《热风·随感录四十六》

㉓ 《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㉔ 《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㉕ 《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